



选择革命



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

CHOOSING
REVOLUTION

Chinese Women Soldiers on the Long March

杨·海伦 (Helen Praeger Young) / 著

朱晋平等 / 译 罗敏 / 校译

选择革命



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

CHOOSING
REVOLUTION

Chinese Women Soldiers on the Long March

杨·海伦 (Helen Praeger Young) / 著

朱晋平等 / 译 罗敏 / 校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美] 杨·海伦
(Young, H. P.) 著, 朱晋平等译, 罗敏校译.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035-4528-3

I. 选… II. ①杨…②朱…③罗… III. 中国工农
红军-女英雄-生平事迹 IV. ①K264. 406②K82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4901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2974

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

责任编辑 西 风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马 晶
责任印制 王洪霞

出版发行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邮 编 100091
网 址 www.dxcbs.net
电 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谨以此书献给那些讲述长征经历的红
军女战士们和那些继承了红军精神的中国
青少年朋友们，希望他们能将红军在长征
中所坚守的信念发扬光大。

——作者

导 言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在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下，中国红军被迫放弃了在中国东部和中部的根据地，冲出重重包围，转战南北。他们力图北上与自己的同志会合，但是屡遭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先是退却到中国西南边陲，最后又辗转北上，穿越青藏高原边缘的崇山峻岭，进入危险丛生的草地。只有 1/10 的红一方面军的战士们在饱受饥寒之苦后，衣衫褴褛地走出草地，又继续奋斗翻越一座高山，终于与在陕北的红军部队胜利会师。一个月后，毛泽东告诉他的将士们：

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查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①

就这样，红军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实现从苏区突围的战略性大转移成为了神话。他们坚忍不拔的毅力、超乎常人的忍耐力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使得长征成为红军不可战胜的象征。中国共产党把“二万五千里长征”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宣传工具，为党和军队凝聚了巨大的向心力。有关长征的故事很快传遍了中国的四面八方。

一位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听到中国共产党转战一年打败中国国民党军队并在陕西站稳脚跟的消息后，立刻意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0 页。

识到所发生的事件的历史影响。他假装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实际上却悄悄来到延安——中国苏维埃根据地的首都。斯诺采访了毛泽东几个小时后，完成了当时唯一一本的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权威性传记，让西方世界了解了红军长征所取得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事迹^①。过了30多年后，迪克·威尔逊，一位西方学者兼新闻记者，出版了第一部关于长征的英文历史著作。该书强调长征的重要历史意义，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非同寻常的转折点^②。长征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分水岭，又充满了传奇的英雄事迹，逐渐成为西方研究军事史和政治史的历史学者及新闻记者关注的焦点^③。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30年代末在延安的另一位美国记者。在她所写的红军总司令朱德传记中，是这样描述长征的：“无论世间万物，抑或万水千山，都无法述说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因为他们无法形容参加长征的十万名红军战士所体现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所遭受的巨大牺牲。”^④

至少有2000名女性参加了长征。她们都是些什么人？为何选择了背井离乡，投身革命并成为红军战士？从本书中她们自己所讲述的故事中，我们得知：她们有些才十来岁，从小被卖到别人家当“童养媳”，因不堪忍受婆家的虐待跑了出来；有些是为了逃避包办的婚姻；有些则仅仅是为了躲避饥饿。而那些能够上学的女学生则是幸运者，她们参加了革命活动，为了逃离国民党的迫害而来到苏区。一些人是共产党人的妻子、姐妹、女儿或侄女。她们都希望在红军队伍中找到家的感觉。

作为一个群体，本书所特写的22位女性比较广泛地代表了参加长征的女战士们。她们分别来自三支主力红军，来自八个不同的省份，其中14个人在17岁左右加入中国共产党或参加红军，有11人在婴儿或儿童时期就被卖给或送给别人家，有12人是文盲。参加长征时，她们的年龄从12岁到32岁不等。她们在长征中的工作包括：为司令部翻译

① 埃德加·斯诺 (Snow, Edgar): 《红星照耀下的中国》 (Red Star over China), 纽约, 1938, 第五章, “长征”, 第171—196页。

② 迪克·威尔逊: 《长征, 1935: 中国共产党生存下来的英雄史诗》, 纽约: Viking, 1971。

③ 除了一般的著作通常至少有一章的篇幅专门写长征以外，最近新出版两本专门写长征的书：一本是索尔兹伯里: 《长征: 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纽约: Harper & Row, 1985；一本为杨炳章的《从革命到政治: 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0。

④ 史沫特莱: 《伟大的道路: 朱德的生活和时代》，纽约: Monthly Review Press, 第308页。

电报，在沿途的村庄从事宣传工作，抬送担架和医疗救护，照顾伤员，在安全部门和党的部门做一些行政工作，或者在被服厂做工、领导妇女组织、参加学校的工作。她们中的一些人嫁给了将军或不同级别的政治委员，或者更基层的干部。另一些人还是未婚，或者在参加革命时离开了她们的丈夫。其中有一位女战士在长征中生了小孩。

她们出生在动荡的 20 世纪初叶，当时的中国政治和社会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动。1911 年延续数千年的帝制统治结束后，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但是推翻清朝后持续多年剧烈的政治动荡，对当时生活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影响并不明显。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几百年如一日地继续着，外界的领袖更迭、政府变换以至于战火纷飞，对他们而言依旧那么遥远。

到 20 世纪 20 年代，在受五四运动洗礼的一群年轻的充满激情的青年知识分子所建立的学校的影响下，社会所发生的变化逐渐渗透到一些省会城市和其他的城市。在这些教师的爱国和革命激情鼓舞下，那些日后参加长征的女学生成了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在 30 年代，当红军在边远的山区展开游击战、创建苏维埃政权的时候，许多面临困境的年轻农村妇女也通过当地的共产党组织参加了革命。她们是在党组织中，尤其是在妇女部门中逐渐成长为领导人。在红军转败为胜的传奇中，她们是当之无愧的“军中英雄”。

在口述采访基础上还原历史的叙述是一项非常耗时的工作。由于本书英文写作所需的资料都是基于中文的访谈稿，这一过程就变得更加漫长。要翻译对西方读者来说非常陌生的词语和概念就更加费时了。不仅如此，由于本书所讲述的中国历史事件，在美国除了少数专业人士外，一般受过教育的民众几乎一无所知，因此有必要为读者提供大量相关的背景知识。鉴于此，自我接到电话开始着手准备写作此书，至书稿完成历经了 16 年的时间，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自 1979 年后便一直生活在北京，在北京广播学院任教，我的工作是将大学本科生培训成英文教师。我是中国政府聘请的第一批外籍专家之一。我们之所以被聘用主要基于学术水准而不是政治认同。1985 年 5 月间，当时中国的社会每一个部门都急于盈利赚钱，我丈夫的一位年轻中国同事问我，是否有兴趣帮助中国一个慈善组织筹募一些国外资助，并且帮助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她的婆婆曾经是中国儿童基金会的主席之一。她和基金会的其他董事是参加过 30 年代长征的红军战

士。她们想知道我是否愿意把她们的故事写出来并在西方出版。我当即表示同意，因非常高兴能有机会研究中国现代历史上这一引人入胜的题目。

这个项目虽然开始时很不经意，但后来的发展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当我同意承担这个项目后，那些最初提议的红军女战士们得到来自最高政治当局——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然而，胡总书记所指定的负责资助此项工作的机构，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发现支持这项工作有些不合时宜。当时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政治变动已初露端倪，但胡耀邦直至一年半以后才被罢免。

没有官方机构的支持，儿童基金会董事会中的许多红军女战士们不愿意接受一个外国人的采访。

在第二年，当我还在教书时，我得到了过去在广播学院的同事，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领导的黄惠春的支持。她认为写一本关于长征中女战士历史的书非常有价值，因此非常热情地愿意帮助我。

1985年12月，我遇到了严景唐先生，他当时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历史学者，是研究红军长征的专家。非常感谢退休的美国外交官员约翰·谢伟思先生亲自致函引介，军事博物馆的馆长秦兴汉将军安排与我的见面。谢伟思先生生长在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华工作。在深受中国政府敬重的谢伟思先生的帮助下，索尔兹伯里准备重走长征之旅。1984年，在秦将军、夏洛特等人的陪同下，索尔兹伯踏上旅途，并最终完成了他的大作《长征日记》。

我虽然一直没有得到相关机构的赞助，但是军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提供了有关长征的地图、背景材料，并且帮助我联系了参加过长征的女战士进行采访。严景唐解释说，军博的历史研究者还没有专门研究过长征女战士，他们非常高兴我能挖掘出一些新的材料。他告诉我这些红军女战士们的姓名、出生日期、数量，以及她们丈夫的相关材料，并且还告诉我谁在长征途中生过孩子等情况。他还给我红军三支主力部队长征时期的年表、地形图和军事、政治结构图等。^①

① 红一方面军1934年10月从江西与福建边界的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红四方面军在1935年春季离开四川与陕西交界的根据地，在四川西部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一方面军又单独北上陕西，在1935年11月到达。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又停留了一段时间。红二方面军由原来的二、六军团演变而来，在1935年11月离开了湖南、湖北和贵州的根据地，他们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师后，一同在1936年11月与红一方面军在陕西会师。

1986年6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出版社同意资助口述历史的研究项目，作为帮助中国儿童基金会募集基金的一种手段。我的同事，中央广播电台的黄惠春女士安排落实了资助。她知道我在美国的大学已经学习了好几年的中文，有关中国方面的知识很丰富，但口语不是十分流利。她派王卫华给我当翻译。王卫华曾经在北京广播学院跟我学习了四年，现在在国际电台英文部工作。随后，黄惠春安排了采访一位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王定国。在位于中央广播电台大楼背后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出版社四楼的办公室，王定国成为我的第一位被采访人。她说：“我出生在四川省营山县，我妈妈告诉我出生在1913年。实际上是1915年的2月，农历在1914年。”

几天后，这个项目的发起人、红一方面军的女战士邓六金，来到友谊宾馆我的房间，成为第二个接受采访的女战士。

在1986年10月，我搬到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校园生活。在北外讲授美国社会史。12月间，三位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何曼秋、权卫华和张文接受了我的采访。同月，恰巧胡耀邦被免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同意我对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进行采访，并出版相关的英文专著。项目刚获官方的批准不久，朱德元帅的遗孀康克清女士同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接受我的电视访谈。她是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中依然健在的级别最高的人物，她身体健康，非常愿意接受采访。她的支持为口述工作的顺利进行打开了方便之门。此后的5年，我可以毫无阻拦地采访更多其他的红军女战士们。

长期从事这一研究项目，我得以有机会建立很多的联系，不断思考采访的过程，做相关的研究，加深了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这对一个在国外进行田野调查工作的学者来说，简直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奢侈的享受。

当我刚开始采访这些参加过长征的女战士时，我原本设想她们所提供原始的叙述，将会更加丰富我们所熟知的关于红军的军事与政治的历史，并增添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从而为这段动荡岁月增添些许除了民族矛盾之外的历史传奇故事。刚开始时，我还不知道这些红军女战士们故事是如此与众不同，将重新建构我们已知的历史知识。随着访谈进行得越深入，我就越清楚地知道我所聆听的并不是关于毛泽东如何一步步掌握领导权的单一历史叙事。女红军们所口述的长征不只是她们之所以选择革命道路中的一个片段。实际上，直到后来当她们听到男性

首长谈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意义后，才明白那段在她们看来似乎很普通的一次军事行动，尽管那是一段长期、艰难的行军跋涉，竟具有如此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女红军首先谈到的是她们入伍后所从事的工作，以及她们是如何适应成为一名战士的政治、军事、体力和社会等方面的要求的。我开始怀疑是否男性的天赋是从英雄事迹的角度来讲述历史，并从历史过程中的具体事件中抽象出伟大的历史意义；而女人的天性则善于将不同寻常的伟大事件整合并吸收至她们的日常生活中。

当我一边采访长征的女红军，并将采访记录翻译成英文时，我还一边在攻读美国社会史方面的硕士课程。随着对社会史理解的加深，我认识到社会史既关注那些对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领袖及其政策、军事将领及其战略，同时也关注历史的其他方面。社会史方面的训练为我提供了组织正在收集的有关长征的史料的基础。我还在教授美国妇女史的过程中，便对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女性的社会角色的转变非常感兴趣^①。当我将妇女史方面的内容融入美国社会史课程后，我意识到当考虑到女性及其贡献后，历史的面貌会是多么的不同。^②

后来，我学会从历史资料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女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做男性做的事情，而是女性实际上做了些什么。换句话说，比如像“女战士们在长征结束后政治地位提高了吗？”之类的问题，改为“参加长征后女性在政治方面有哪些收获？”在她们所取得的诸多成就中，女性拥有了第一部成文的法规，1949年共产党执政后开始实施。通过对照分析长征前后及长征过程中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婚姻法为妇女赢得了稳定的权利。

无论是采访那些后来成为著名领导人的知识女性，还是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访谈的价值都得到了证实。通过访谈使我能够更加平衡地勾勒出这些女性早期的生活场景，将一些过去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搬上历史舞台，并帮助那些普通人从无声无息中走出来。

当然，这些当年选择参加革命后来又完成长征的女性绝非等闲之

① 在这一时期我第一次读到约翰·凯蒂（Joan Kelly）的讨论，称当她在劳伦斯学院听了戈达尔·勒纳将女性纳入历史内容的课程后受到很大冲击，这一冲击改变了她思考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方式。见凯蒂：《女性、历史、理论：约翰·凯蒂论文集》一书的“导论”，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在一本关于印度革命妇女的口述历史专著中，编者注意到：“对我们而言，我们所写的历史知识结果很可能是亚群人的历史。”Stree Shakti Sanghatana：《我们创造历史》，伦敦：Zed，1989，第32页。

辈。大多数农村的妇女未能成为在当地的中共组织中的领导，也未能离开家庭参加红军；大多数的青年学生也没有参加共青团，并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大多数的妇女姐妹未能跟随他们的兄弟与丈夫参加革命工作；大多数饱受饥饿折磨的孩子也没有跑出来参军。在 50 多年后，这些愿意接受采访的红军女战士具有无比坚韧的毅力和乐观向上的人生信念，使得她们能够超越生命的极限。

这些访谈在多种场所进行，经常由接受访谈的女红军来选择。第一次是在国际广播电台出版社的办公室，第二次是在友谊宾馆我的房间，后来又在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我的房间里，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接待处办公室，在北京军事历史博物馆，在其他城市的宾馆及会客厅，以及在被采访者自己的家中。一些女红军是独自来接受采访的，有些是由朋友或家人陪伴而来的。在北京的军博、江西和广东采访时，军事历史学家也一同参加采访。每次采访时，王卫华都和我一同工作，由于她的工作非常繁忙，在她有事耽搁或需要提前离开时，有一两位她原先的同学会暂时替代她帮我翻译。我的丈夫是美籍华人，他精通三种中国方言，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他会陪同我一起访问。还有一两次是由老齐，一位退休的幼儿园老师，陪同我一起访谈的。

在我采访红军女战士们的过程中，王卫华一直是我的合作采访人和翻译，能与她合作是我人生中难得的机缘。卫华在北京广播学院学习的四年期间，我担任过她的任课教师。当时班上共有 17 名同学，我与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卫华在毕业前便开始在广播电台当记者，我们第一次访谈时，她已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工作了。经过我们几年的合作，她逐渐成长为研究型的新闻记者，开始主持中央电视台的英语新闻节目。她逐渐成了全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既主持英语新闻节目，同时也是深受大众喜爱的大型电视片的主持人。

被采访的女战士们非常高兴卫华对她们的故事感兴趣。她们非常兴奋能有像卫华这样的知名主持人当自己的听众。卫华“长在红旗下”，没有经历过解放前的事情，所以听得全神贯注。她们对卫华讲述往事时，能够非常放松地娓娓道来，不像面对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容易分散注意力。

许多被采访者都要求事先看看我们准备的问题，结果她们都非常惊讶我们所提问题的性质。我们不断地提一些非常简单的问题，比如：您是哪年出生的？出生在哪里？您为什么参加红军或入党？您还记得女红

军有哪些英雄事迹吗？她们非常奇怪地发现我们不是在找寻有关长征的军事或政治的历史信息，而是想知道她们自己的经历。长期生活在不重视个体的文化背景下，这些红军女战士们有时会因我们对她们个人生活感兴趣而显得有些局促不安。考虑到文化方面的原因和她们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的特殊身份，我们始终把问题限制在一定的范围。既没有问关于她们与性相关的问题，也没有探究她们的婚姻关系以及关于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问题。

毫无疑问，有其他人陪同访谈会影响她们的叙述。当她们的亲属、秘书或者军方的历史学者纠正时间和地点的错误时，她们会被经常打断，时常会被分散注意力。当红军女战士们单独或在亲密的朋友和家人陪同访谈时，往往会在录音结束后告诉我们很多闲闻趣事。另一方面，有几位女红军直截了当地当着中方官员的面说，她们所讲的事情不希望出现在中文出版的书中，可能会受到来自官方或秘书的干预。但我和卫华都认为干扰她们畅所欲言的最重要原因不是在现场的其他人，而是她们不得不自我保护，躲避公众的审查。“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这些所有的女红军们都被要求写自己的经历，一些人试图澄清自己所遭受的误解，或者与某项对自己不利的指控划清界限。比如，有一位受访者非常详细地讲述了她为自己缝制的一件连衣裙，那时她还是十几岁的花季少女，是一位秘密的地下工作者。她提及此事显然是为了证明其他的事情，因为此事与长征毫无关系。还有一些人则有意要隐藏一些事情，比如某个不雅的名称，关于父母的身份，或者过去的反抗社会的过激行为。不仅如此，每一位受访者都或多或少急于讲述共产党与红军历史中积极光明的一面，有意略去在她们看来视为黑暗面的事情。

由于女战士们接受采访前通常会记忆起她们自身的往事，当突然被打断时，她们会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刚开始时，由于我所掌握的中文词汇有限，我们的访谈会时常因翻译问题而中断。随着我掌握的军事和政治术语越来越多，需要翻译的词汇越来越少了，叙述也就变得更加流畅自如了。对一些女红军来说，采访非常容易，只要让她们自己说就可以了。而有些女战士则因口音太重或是思路不清，必须通过不断地提问来澄清相关问题。

我们经常是围坐在桌旁，如果方便的话，手边还放一个热水瓶和一杯热茶。我们使用的是双卡录音机，先打开一个开始录音，几分钟再开另一个，这样能够避免经常换带而打断谈话。

当我们将我们的生活转变为叙事时，需要寻求故事的开头和结尾，突出其中的矛盾和问题的解决，融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我们要有所取舍，略去那些与故事内容不符或者离题太远的部分。我们采访的这些红军女战士们故事也是如此。有时我们所提的问题能让她们从所记忆的生活结构中跳脱出来，谈论她们自己的经历。这类的问题经常涉及她们认为不重要或者不是很敏感的一些生活细节。幸运的是，我们认为重要的内容和她们看重的事情不同，如我们愿意了解她们的童年生活，她们参加革命的原因，与其他女性之间的非政治性的交往，她们在长征中的个人经历。这些问题她们都可以自由地交谈。

若干记忆有误的、可以查证的历史史实，比如日期、人名均在注释中订正。例如在第七章里，王泉媛提到裹着小脚走完长征的女性是第九军政委的妻子。我在注释中注明了名字，并订正了她的丈夫是第九军司令员，不是政委。

我们处理年代有误这类问题的方式，是打断她们离题太远的政治与军事历史方面的叙述，问她们：“你在当时知道这些吗？”我们想知道的是她们个人的历史，而不是她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所理解的官方的军事和政治的历史。

她们的若干回忆在不断地重复讲述过程中，已经变成了神话故事的一部分。王泉媛说她的视力很好，能够看到敌人射向她的子弹发出的光，她能坐船过河时躲开子弹。我们觉得这无碍大局的夸张也是可以接受的。危秀英在讲述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会议的情形时，有很多时间记忆错误的说法，视觉方面的描述是从电影和革命戏剧中借用来的，因此，我们认为她的话需要打折扣。

添枝加叶的记忆抵消了某些记忆中的空白，让许多历史细节从她们的记忆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例如，陈仲英根本就回忆不起来上海国民党监狱里的情形。当年她和襁褓中的女儿曾在那里被关押了将近一年。尽管我们绞尽脑汁地慢慢启发她的记忆，但是她始终无法描述当时的情况。

许多女红军已经不能描述她们所经过的省份的自然地理概貌了。当让她们讲讲所爬过的高山时，一位红一方面军的女战士三言两语就打发了我们的问题：“山就是山啊——还能是什么？”邓六金是我们的第二个受访者，她对所经过地方的自然景观几乎一无所知，以至于我怀疑她对长征是否有真实的记忆，还是她告诉我们的都是她听来的或者从别人的

叙述中读来的。我们采访的红军女战士越来越多了以后，发现大多数人都无法形容她们经过的那些风景优美的自然景观。我也意识到这不是记忆力缺失所导致的问题，而是因为她们当年根本就无暇顾及周围的环境。她们要夜里行军，体力消耗很大，每天必须以每分钟 120 步的速度才能保证跟得上队伍，每人还大约负重 18 斤；她们还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艰难的山间小路，而且越走越饿。这些都使得她们无心去欣赏如画的风景。

她们记忆最清楚的就是身体方面的，但都是非常个人化的感觉。她们对自己或别人生小孩的事情都有记得一清二楚。她们对卫生条件差的情况下来例假的痛苦和尴尬记忆犹新，有些男战士不明白她们流血的原因，还以为是受伤了。她们记得当时生病了，非常害怕因无法赶上部队而被留在当地。她们对来自其他的女同志，尤其是女领导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记忆深刻。

除了记忆方面的问题外，在翻译相关词语和概念的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挑战。

最令我疑惑不解的问题是，在长征的过程中这些女战士的婚姻家庭观念是什么？因为那时没有固定的家，也不可能保存相关的记录。

在本书的第七章，危秀英讲了一个女战士和喜欢她的上级领导一起离队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助于说明要弄清楚当时婚姻的真正状态时非常困难的。因为在她所讲述的故事中，她似乎觉得只要两个人睡在一起就是夫妻了。王泉媛还讲述了在长征途中她自己 and 一位高级首长结婚的事情。他们的婚姻是经过组织同意后批准的。但据危秀英说，王泉媛在老家已经有丈夫了。我把两个故事联系在一起，希望通过它们的并置——虽然无法完全解决——但能增进我们对当时的女战士们的婚姻观念的理解。

生日和年龄是有关概念方面分歧的另一个例子。在第一次采访时的第一句话，王定国就告诉我们：“我母亲告诉我，我出生在 1913 年，实际上是 1915 年 2 月。”她母亲依据的是中国的阴历，而不是现在所通用的西历。此外，中国传统关于年龄的概念和西方的实际情形完全不同。在王定国的母亲看来，她出生后的第一年就已经一岁，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出生后的第二年开始时才满一岁。王定国的生日之所以会出现两年的偏差，是因为在这个注重集体文化的国家，所有的生日都是按照阴历一年开始的时间来计算的，而不是根据每个人的实际出生日期。

因为王定国的生日临近春节，所以她刚一出生就长了一岁，而且她以后每次过生日时，都会同时长两岁。

关于童年的理解也很不相同。在这些女红军的叙述中，她们几乎没有一段独立的、特殊的现代概念的童年时期。大概在六岁以后，中国的农村孩子就要和成年人一样在家里、店里和地里干活儿。有些孩子从家里偷偷跑了出来，参加了红军，他们被称为“小鬼”，有些还参加了长征。当王定国告诉我们“小鬼”们在长征途中和成人一样要背着粮食行军时，实际是在强调这些“小鬼”其实被当成了小大人。她解释说，成人的背包是由裤腿做成的，而小鬼们的背包则是袖筒做成的。

还有些需要澄清的，是由根深蒂固的语言习惯所产生的概念歧义。在汉语口语中 ta 的发音是分不清性别的，实际包含着“他”、“她”、“它”三种可能。例如，如果我们不问工作组的领导究竟是男还是女的话，我们根本无法知道她或他的性别。要是前面没有提及或这句话的主语被省略的话，ta 就更加令人迷惑不解了。

另一个问题就是广泛使用的“敌人”一词的意思。根据不同的情况和场合，敌人可以是指地主的打手或者地方上的民团，没有组织的土匪、军阀的武装、国民党的部队，或者秘密侦探。在本书中，我尽量说明被采访者所提到的敌人的具体所指。

用来描述女性——无论是受过教育还是没受过教育的——总体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其在家庭中的地位时，所使用的经典词汇是“重男轻女”，这也是我在不同语境中经常遇到的一个词语。英文中没有关于“重男轻女”的固定表述，从字面上可翻译为“heavy on boys, light on girls”，或者更随意些，也可以翻译为“favoring sons while treating daughters lightly”。根据叙述者和她使用这一词语时的具体语境，我采用了几种不同英文翻译，但具体所指都是“重男轻女”。

“家”这个词，可以翻译成英文的“home”或者“family”，具体所指有两层含义：一是由婚姻或家庭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一群人，二是所有家庭成员的居住场所。当党和军队成为革命者的家庭替代物之后，“家”作为居住场所在女战士们心中的重要性已大大减低了。她们讲到：“我们总是不停地行军，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逃离敌人的密探或火力，跳上火车或者轮船来躲避敌人，开始一项新的工作，或者将孩子交给丈夫的家人抚养。”许多女战士都说党就是她们的家。

还有另外一个与家相关的概念，就是家长制的问题。由于家庭成员

总是处于家长的管制下，当蹇先佛说：“我的家人鼓励我参加革命”，或者刘英说：“我的家人反对女孩子受教育”时，她们所指的实际上是她们的父亲，作为一家之长的态度。因此，当刘英说起她的母亲如何帮助她上学时，她不会觉察到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这里提出另外一个关于如何理解这些女战士们的语言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中，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是按照一种想当然的方式来表述的。比如说“所有人都参加共产党”，并不意味着村里的每一个都参加了，甚至也不意味着大多数人参加了。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只是表明在说话的人或者那些确实参加革命的人的心目中，加入党组织是非常令她们向往的行为方式。

邓六金说起她和其他同志参加第一方面军长征前的体检经历。她激动地说：“我是最健康的。”当钟月林也说她是最健康时，我很疑惑她们两个怎能同时都是最健康的呢？我试图从自己的文化背景来理解她们所说的意思。从她们强调复数的“我们”而不是单数的“我”这一语境来看，她们的意思应该是说：“我们这些被选中参加长征的都是最健康的”。

另一难题是这些女战士们用来称呼配偶的专门用语。“老头”是指男人，“老婆”是指女人，还有与性别无关的“老伴”。尤其是“老头”在英文中通常是与“guy”（家伙）意义相近的常用词语。英文中最为接近的说法是“my old man”（我的老男人）或者“my old lady”（我的老女人）。但是，由于英文的微妙含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对不同时代的人而言，他们所指的意义是不同的。对我这个年龄的人而言，“my old man”是那些受男性强权压抑下的贫穷的工厂女工们经常使用的词汇。考虑到英文语意的变化，我使用“my old companion”（我的老伴）来翻译老头、老婆和老伴。这样既避免了相关的问题，又反映了中文的原意，但却不能表达出其中所隐含的阶级与性别的含义。

还有几个用语在文化上毫无契合之处，而且也没有相对应的英文表述。对于这种情况，我选择使用中文的音译。比如，大姐（dajie）这个词，从字面上理解，它的意思是“Big sister”，但是中文的“大姐”含有尊敬的意思，常用来表示对比说话的人地位高或年龄大的女性的一种发自内心的钦敬。所有的受访者在谈及参加长征的其他女红军时都使用“大姐”这个称呼。

另一个我有意保留、未加翻译的用语是“童养媳”，用来指那些在

青春期到来之前就被自己的亲生父母送给或卖给别人家的女孩子。童养媳有很多不同的英文翻译，比如“child bride”（儿童新娘），“small daughter-in-law”（小儿媳）或者“affianced daughter-in-law”（订婚的儿媳）。尽管童养媳的地位与相关规定从不同的地方到不同的家庭都千差万别，中文里面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我还是选择用“童养媳”，因为它是每个受访者都使用的说法。有些童养媳婴儿时期便被送人，有些要到六岁以后才被领养。在我们的受访者当中，那些婴儿时期便被收养的童养媳境遇要稍好些，会被当成家人对待；而那些年纪较大才被领养的则通常会被当做女佣对待。受访的童养媳当中仅有一人与婆家的儿子完婚。其他的都被她们后来参加革命的未婚夫们当做姐妹或者同志，而不是未婚妻，实际上解除了婚姻关系。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当王卫华和我第一次访谈时，我们立刻把录音的内容都翻译出来。由于卫华的工作越来越紧张，她经常无法花大块的时间来帮助我采访，并立即将录音的内容翻译成英文。除了卫华经常陪同我一起采访外，我还得到其他的中国的同事和学生们的帮助。她们非常慷慨地奉献出宝贵的时间来协助我的研究，帮助我翻译。

尽管翻译者不断变化，但是翻译工作从来没有停止。卫华或其他的翻译者和我一起听采访录音，她逐字逐句地翻译成为英文，然后由我输入电脑。翻译一盘磁带大约需要六个小时。我们在翻译成英文时尽量保留中文的原貌。因受访者所说的中文非常简单、粗浅，所以我们在翻译时避免使用非常复杂的英文句式和正式的书面语言。在翻译这些只接受过很少教育、几乎没有文化的红军女战士的访谈记录时，我们尽量使用源于盎格鲁撒克逊的词汇，而不用源自拉丁或希腊语的比较正式词语。否则的话，在经过翻译和书面加工后，这些女战士们可能会变得知识渊博，精于世故，与其本来的面貌大相径庭。举一个例子来说，在由毛泽东的医生所写的英文版《毛主席的私人生活》一书中，引用了陈琮英回忆毛泽东的一段话：“他的脾气非常可怕，只要稍有触犯他就会毫不留情地反对你。”这段话经过一个受过教育的医生翻译过来后，遣词用句都很讲究。从译文来看，陈琮英也应该受过良好的教育的。但实际上，这段译文的中文原文能更准确地反映她的语言水准，她说：“老毛脾气很坏，他能随时翻脸不认人。”

在反复修订未经加工的原始译稿时，我会在意思清楚的前提下，尽